



纪念杨贤江诞辰110周年丛书

潘懋元 华长慧 宋恩荣 主 编

喻立森 执行主编

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

钱忠源 选编

尹晓军 许军国 修订

光明日报 出版社

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

钱忠源 选编
尹晓军 修订
许军国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潘懋元等主编.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4

(纪念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丛书)

ISBN 7-80206-045-1

I. 杨... II. 潘... III. 人生哲学—文集
IV. B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726 号

- 书 名 纪念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丛书
主 编 潘懋元 华长慧 宋恩荣
执行主编 喻立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邮编: 100062)
责任编辑 鲁 葳 王明光 汪吉明
策 划 汪吉明
封面设计 华根工作室
激光照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91.75
字 数 2642 千字
插 页 32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206-045-1/G
定 价 300.00(全 1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纪念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丛书》序

潘懋元 华长慧 宋恩荣

《纪念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丛书》出版了。这是国内教育理论界从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是宁波地方政府与贤达致力于打造历史名人文化、重视弘扬杨贤江精神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林林总总 10 册,洋洋洒洒三百万言。它不仅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许多遗憾和空白,而且还创造了一个专家学者与地方贤达真诚合作,协同攻关的科研范例。

杨贤江是宁波人。他于 1895 年 4 月 11 日出生在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现属慈市长河镇贤江村),1931 年病逝于日本长崎。在极其短暂的三十六年中,他发愤苦学,奋力拼搏,艰难探索,与时俱进,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我国早期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杨贤江在我国教育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率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教育历史,剖析教育现象,阐明教育理论。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在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中国革命的曙光刚刚显出端倪,但又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式下,他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教育本质,抨击资本主义教育思潮,阐明了那个时代迫切需要并对后来产生了重大影响作用的现代教育理论。

杨贤江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期间。1919 年 9 月,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杨贤江,经恽代英、邓中夏等人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南京分会书记,负责编辑会刊《少年世界》与南京高师学生刊物《少年社会》。这对步入社会不久、急于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杨贤江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取新知、经受锻炼和增长才干的极好机会。他积极参加学会活动,经常与进步青年举行讨论会、讲演

会,探讨与介绍国内外新出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流派。这期间,他充分利用南京高师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国内外名著,大量浏览各种报刊资料,并在与李达钊、恽代英、邓中夏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交往交流中,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懂得了苏联“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坚定了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民主主义革命立场。

杨贤江的政治信仰及其教育思想的深刻变革,发生在1921年到上海工作以后。1921年2月,杨贤江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之聘,担任了《学生杂志》编辑。环境的改变和工作的稳定,极大地焕发了杨贤江的内在动力。他在废寝忘食地致力于《学生杂志》改版刷新的同时,又日以继夜地学习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这期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在上海发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这给追求进步的杨贤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与强大的精神动力。杨贤江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又是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场所之一,上海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沈雁冰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编辑,与杨贤江交往甚密,情谊笃深,两人经常一起交流心得体会,讨论人生、信仰、社会与时局问题。杨贤江自己更是拳拳以诚,孜孜求索。他反复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名著,后来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种种因素促使杨贤江快速地成熟起来,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2年5月,经沈雁冰、侯绍裘介绍,杨贤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标志着杨贤江的人生观及其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与根本转折,一个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素养与品格业已形成。1928年,杨贤江撰写的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著作《教育史ABC》问世,1930年,杨贤江撰写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著作《新教育大纲》出版。从而最终奠定了杨贤江作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的历史地位。

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来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认真探索与深入研究,同时也来源于他对古今中外教育理论的广泛涉猎和对教育实际的真切观察。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五年求学期间,

在努力学好各门功课的同时,广泛阅读教育书刊,潜心于教育学、心理学研究,并开始发表教育时论。在 1917 年 9 月至 1920 年 4 月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期间,更对教育理论产生了浓郁兴趣,不仅抽空跟班听课,而且还经常向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讨教疑难,受益匪浅。1920 年 9 月,他经由香港前往广东肇庆,准备担任高要县立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恰遇粤桂军阀内战,以一个“乱世之民”困处肇庆 50 日,亲身体验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加深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非把社会组织从根本上改革一番”,不足以拯救中国。此时他已经作好了独当一面,干一番事业的心理和智能储备。1921 年 2 月至 1927 年 2 月,杨贤江受聘编辑《学生杂志》,更为他关注教育实际,研究现实问题,清理理论思路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编辑《学生杂志》的 6 年时间里,他给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生通信、答问、释疑 3000 多次,经常到上海一些大中小学调研、听课、讲课,还曾一度兼任著名的上虞春晖中学教务主任。据此,我们可以说,杨贤江不仅是一位知识广博、功底深厚的教育理论家,同时也是一位阅历广泛、经验丰富的教育实践家。他的这种理论家的实践阅历与教育实践家的理论修养,促成了他在教育理论研究中知识和经验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贯通,形成了杨贤江的关心国家前途、关注人民疾苦、紧扣时代脉搏的无产阶级教育理论家的品质和风格。

杨贤江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来源于对国外教育理论的扬弃吸收与合理借鉴。20 世纪初期,正是国际形势激烈动荡,思想观念变化万端的变革年代。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教育理论界正在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重新审视教育现象,力图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这引起了杨贤江的莫大兴趣和热情关注,他研读和翻译了大量苏联教育论著,在吸收理论养分的同时,将这些新观点、新认识、新理论介绍到国内。这个时期,也是欧美国家教育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特殊年代,新教育运动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合流,推动着“教育新潮”汹涌澎湃,拍岸而来;苏联教育理论的创新与重构,也迫使着西方教育理论要寻找对策,谋取革新之路。20 年代前后,美国教育家杜威“周游列国”,“布教全球”的行动,就是传播西方教育

观念,推动“现代教育思潮”的一个明证。这不能不引起意识敏锐、思维成熟的杨贤江的密切注意和探索研究,这些教育思想的积极、进步与精华部分,也自然被吸纳为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继苏美之后,对杨贤江教育思想起过影响作用的,还有日本“维新”之后的教育思想。20年代末期,杨贤江曾经东渡扶桑,在日本生活的近两年中,又正是他潜心著述、成果卓著的学术鼎盛时期。“避难”中深居简出的隐蔽生活方式,客观上为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整合”与系统化提供了时间条件和空间保障;英语和日文兼优的特长,似乎让杨贤江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深入研究日本教育,大量阅读外文原著,大批译介外国文献,有些介绍“苏俄新教育”的书籍和文章,就是直接从日文版书刊中转译的。国外“新潮”的吸纳,认识视野的扩大,无疑使认识独到、见解非凡的杨贤江更加地充实和成熟起来。所以,他的传世之作《教育史ABC》不是写在中国而是写在日本,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自然之事。

杨贤江的教育思想是那个时代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境界,也是以后中国教育理论走向与发展的根本指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贯彻的正是杨贤江的教育思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教育,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又成为基本依据之一。这是因为杨贤江的教育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实际的统一,反映了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逻辑一致性。这正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价值之所在,生命力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探索、研究与传播。在高等学校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课程上,曾经专列一章介绍杨贤江的“现代教育思想”。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以后才逐渐恢复。1981年8月9日,教育部、团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大会”,对杨贤江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做出了充分肯定。为了推进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1984年3月2日,胡乔木同志接受叶圣陶、胡愈之、吴亮平、李一氓、夏衍五位老前辈的建议,批示教育部筹备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1984年9月5日,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在北京成立。1985

年 9 月 5 日,全国第一次杨贤江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宁波余姚召开,与会代表到慈溪长河参观了杨贤江故居,同宁波地方政府与贤达一起商讨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合作事宜。从而将专家学者对杨贤江教育思想的研究热情,与宁波地方政府与贤达弘扬杨贤江精神的良好愿望结合了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开展,不断开创出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继“纪念杨贤江同志逝世 50 周年大会”之后,教育部、团中央以及中国教育学会,分别主持召开了“杨贤江逝世 60 周年”与“杨贤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还于 1986 年、1987 年、1989 年、1990 年、1992 年分别在上海、天津、慈溪、黄石、南昌等地召开了学术研讨会与理事会工作会议,先后编辑出版了《杨贤江教育文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杨贤江纪念集》、《杨贤江传记》、《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杨贤江全集》、《杨贤江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等书。连续不断、渐次深入的研究活动与逐步推出的研究成果,使杨贤江的名字与思想业绩,由过去不为人熟知,而成为教育理论界尽人皆知;陆续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中,杨贤江的教育思想都占有一定篇幅;高等师范院校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讲坛上,杨贤江的思想地位有了较为充分的反映。

2005 年 4 月 11 日,是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令人难忘的日子,缅怀这位教育大师的卓越建树,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组织编辑了这套《丛书》。书目有:

1. 潘懋元、宋恩荣、喻立森著:《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
2. 金立人、贺世友著:《杨贤江传记》。
3. 喻本伐著:《杨贤江“新教育”理论的形成》。
4. 杜学元、吴吉惠等撰著:《杨贤江年谱长编》。
5. 吴洪成、陈淑霞等著:《不朽的革命人生 辉煌的教育成就——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的理论与实践》。
6. 陶尧土、潘巨良、沈建云主编:《杨贤江与余姚诚意学堂》。
7. 沈百宗、张幸华、盛世雄主编:《前进中的杨贤江中学》。
8. 慈溪市长河镇人民政府组编 沈德林、周建华编写:《伟大的

一生 不朽的业绩——杨贤江生平事迹简介》。

9. 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编 王伯康、张建国、柳国梁修订：《杨贤江纪念集》。

10. 钱忠源选编 尹晓军、许军国修订：《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

编辑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套高质量丛书；实现历史与现实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内容与形式兼优，尊重历史原貌，注入时代精神，打造丛书精品；选题注重填补空白，内容强调充实丰富，立论讲究持之有据，文字力求通俗流畅。《丛书》中有的可以作为学术著作流传后世，有的可以作为校本教材供地方中小学选用。

《纪念杨贤江诞辰 110 周年丛书》的出版，既是国内专家学者、亲属乡贤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又是宁波地方政府与贤达大力支持与热心资助的结果。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该《丛书》列为 2004 年度规划课题，宁波市教育局提供了必要的研究经费资助，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承担了具体组编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编辑出版任务。这是我们应该特别予以感谢的。

此外，《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杨贤江传记》、《杨贤江纪念集》、《杨贤江论“全人生指导”文选》四本书，是依据原版重印或修订而成的，还应感谢这四本书的原出版社，即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天津人民出版社友好出让最初版权，使我们得以荟萃成套，一次推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杨贤江的教育思想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对这一思想的探索研究仍应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在 21 世纪条件下，我国教育面临着知识经济社会、信息化时代与全球化思潮的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全面发展新人，教育观念和教育理论要求与时俱进、变革创新。在这种形势下怎么发掘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新内容、新价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新任务。我们

将再接再厉,继续探索。更殷切希望年轻一代研究者不断开拓,耕耘出新的丰硕成果!

由于时间仓促,《丛书》中的遗憾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2004 年 12 月 29 日

序

叶圣陶

杨贤江同志逝世于三十年代初期，我跟他结交仅有十年。十年不能算长久，可是前一段我们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后来他病了，我常去看望他夫妇俩，所以我能大略知道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

贤江同志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实干家，从日常生活到从事工作，他都讲求踏实力行，丝毫不肯马虎。他的生活极有规律，起床，体操，读书，工作，休息，他都给自己规定在时间表上，严格照办。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学生杂志》，在会客室里，跟来访的青年谈话的时候相当多，在编辑室里，埋头在读者的来信堆里的时候也相当多。他根据来访者和来信者提供的材料和提出的问题，写成“通讯”刊登在《学生杂志》上，每期八九篇十来篇，有一期多到二十篇。这些“通讯”有的反映青年学生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情况，有的讨论学校里的问题和社会上的问题，全都是牵系在青年们心上的事。在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创刊之前，联系知识青年这样密切的刊物就只有《学生杂志》一种。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学生杂志》每期登载十来篇“通讯”，贤江同志还嫌不够，于是开辟了“答问”一栏，简明扼要地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由贤江同志回答提问的读者共有七百多人，问题一千多个，单看这个数目，他的工作量就大得叫人吃惊了。《学生杂志》不是共产党的刊物，贤江同志又不是《学生杂志》的主编。当时是军阀统治时期，要在此时此刊宣传革命，真够费劲的了，一方面要抓住各个切当的时机，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尽最大的可能去影响青年学生；一方面又要妥善地应付恶劣的环境，处好种种复杂的关系。因此贤江同志的工作看起来好象挺平常，其实是极不容易的。

现在选取贤江同志当年登载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的文章，编成这本《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出版，我认为挺有意义。其一，谁都要讲求修养，青年正当发展成长的旺盛时期，尤其要讲求。其二，贤江同志谈青年思想修养的这些文章虽然是半个世纪以前写的，对现在的青年还极其切用。因此，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纪念贤江同志，也是对广大青年最好的贡献。

我说“对现在的青年还极其切用”，试举几个例子。贤江同志谈求学是这样说的：“把求学限定是读书，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画分，这都是错误的。学生是求学的，学生是读书的，但不能就说求学即读书，读书即求学。”（《求学与做事》）

简要的几句话，贤江同志把古来多数读书人的错误观点揭出来了。清朝末期废了科举，办了学校，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民国，仍旧办学校，承袭古来错误的读书观点的人依然不少，直到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种错误的读书观点还没有在社会上和学生中断根绝迹。贤江同志点明求学和读书之间不能用个“即”字连起来，意思就是读书只是求学的个项目，此外还有很多项目，就是从事事物物中读不用文字写的书，也就是跟事事物物直接打交道，做各色各样的事。所以他说把求学与做事绝对的画分是错误的。他的意思就是求学和做事应该一直同时并举：求学的时候不光是求学，还要做些切实的事以期学得扎实；做事的时候不光是做事，还要继续深造，更求精进。这样的观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期望早日完成四个现代化的今天，不是非常切要可贵，值得教育界和在校青年、从业人员作为座右铭的吗？

贤江同志主张求学和做事都要究明动机。他说：“我们求学，我们做事，都有他正当的动机。这个动机是什么？就是为了贡献人类，为了利益社会。出于这个动机而求学办事的，就是纯洁。不出于这个动机而出于赚钱、得势、享名、行乐或别种狭隘的私利的动机而求学办事的，就是不纯洁”。（《动的青年底修养》）

我读这几句话，对贤江同志的虔敬心情无法描摹，只能说这样一句话，“贤江同志呀，您真是个纯洁的人！”同时我诚恳地祝愿当代的青年，希望你们求学和做事全都出于这样的动机，因而全都成为纯洁的人。

贤江同志提倡做人要做主动的人。他说：“在主动的人，他常常觉得有许多事要做，常常要提出问题来解决，常常想法子来应付环境当中的困难。所以他能独出心裁，独辟蹊径，不因循，不偷惰，也不嚣张。但在被动的人，若是外界没有刺激进来，他就会漠然不动，就是动了，而动的程度与时期也以刺激的程度与时期来规定。他不能做过于刺激的分量与性质的事，因为他自身原来没有发动的力量，自然不能自作主张，自出意匠，但当受着刺激的时候，他也许有热烘烘的态度，气扬扬的行动，不过这自然是一时的发狂，等到刺激去了，就会消灭了。”他又说：“做前面一种青年，那是做人的材料，做后面一种青年，那是一种做器的材料。……成人乎？成器乎？就要看动的态度来分判。”（《主动与被动》）

“成人乎？成器乎？”你不想修养，不愿修养，当然不成问题。如果要修养的话，这就是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恳切期望当代青年重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不再举例了，请青年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己细细体会吧。因为自己体会得来的比听人指说的更为深刻，更为切用，这是教育学方面极为可靠的常识。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六日作

序

潘懋元

杨贤江同志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又是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有关青年教育与青年修养的文章和书信,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些文章和书信,不但在当时起着引导青年、鼓舞青年走向革命的作用,今天仍有教育青年、指导青年健康成长的现实意义;不但对青年人有着直接的教育意义,对于从事青年教育工作的教师 and 政工干部,更有重大的指导作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贤江教育文选》,着重选编有关教育原理和教育发展史论著,当然也选了若干有关青年教育的文章和书信,但数量较少,不足全面地反映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观点、原则、方法与丰富的内容。天津人民出版社编选的《青年修养与青年教育》这本书,集中地选编了杨贤江关于青年修养和青年教育的文章,既可补前书的不足,又方便于广大青年和青年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对于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光辉的思想,对于当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地具有重大的意义。

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文章,写于五十多年前。五十多年的中国历史,时间虽不算长,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

而且中间还经过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社会主义的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二、三十年代,不但社会制度本质不同,国民经济、人民生活、文化科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这样不同的时代背景的青年,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是不可类比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有延续性与继承性: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的精神财富,而其糟粕却成为后代人沉重的精神包袱。不可否认,封建主义的余毒至今尚未肃清,在十年动乱中还有所滋长;资本主义思想和生活方式仍在不断侵害和影响青年人的思想和行为。杨贤江针对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实际所提出的某

些意见,仍值得我们参考,他教育青年、指导青年的原则与方法,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

下面,谈谈我学习杨贤江有关青年指导理论的几点体会:

(一) 杨贤江关于青年指导的基本观点是:以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杨贤江认为对于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是“人生目的”的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他分析当时青年学生中,存在许多错误的思想和问题。如有的沉醉在古书堆中;有的糊里糊涂混分数;有的不问国家社会,只顾自己的私生活;有的随波逐流混日子;还有的因无力升学而悲观消极;有的因对政治不满而想遁世隐居;有的因失恋而想自杀等等。他认为这些表现都是由于缺乏革命的人生观,或虽有朦朦胧胧的改造社会的要求而缺乏信心与勇气。因此,不论从社会改造或个人改造来说,关键在于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使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他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对全体人类有贡献,来促进人生的幸福”。“世事的好坏,大概是由制度环境造成的,我们做青年的,应该有积极的爱世的人生观去从事改革。”对于青年学生来说,首先应当解决两个问题:(1)我们为什么求学?(2)我们和社会国家有什么关系?他指出,求学的目的在于“改良并丰富人类的生活,在于获得人类普遍的幸福”。青年求学的大目的,实在只有“为改造社会”五个字,“无论研究何种科学,都要抱着‘为改造社会’的存心”。

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青年中最大的障碍是享乐的人生观。享乐的人生观使人一生无大志,只是“专谋自身快乐”。他认为持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把这个“人”字看得太小了。他们不懂得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谋“全体人类的利益”。同时,由于他们“过分重视物质生活”,“专谋自身快乐”,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剥削人民的利益以享受豪奢放纵的生活。这种人,自身也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生活”,因为“圆满的人生是心身调和的发达”。物质享受而精神空虚的人,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所以,树立革命人生观,“先要自我解放”,不可“独善其身”,而应把自己作为社会的个人。

为了教育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立志改造社会,他鼓励青年学习新兴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关心时事,关心政治。在二十年代初,

他就提出学校里应当以“唯物社会观”教育学生,开设“社会运动指导”课程。在他所编的《学生杂志》上,除了发表大量的论述革命人生观与社会改造的论文、短评之外,还指导学生阅读《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学说概要》、《资本论入门》等社会科学著作,并介绍《向导》、《前锋》、《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以及苏联当时的革命书刊,号召青年走马克思、列宁所指引的道路。

正如杨贤江所指出,青年“对于人生的问题,总该有个确定的观念”。青年,正是人生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反对享乐的人生观,同样是今天青年指导的根本问题。今天,有些青年所缺乏的正是革命的人生观,为“四化”建设,为人类幸福服务的远大理想;他们所孳孳营求的物质享受、舒适生活等等个人“实惠”,正是由于把“人”字看得太小,或者干脆说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小了。对于一个看不起自己的人,什么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组织纪律教育,什么舍己为人,公而忘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四化”等等大道理,如果不是逆耳之言,也是耳边风而已。杨贤江总结他长期从事青年工作的经验,认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人生目的”的教育,对今天青年教育工作者仍然是重要的启示。

但是,青年人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青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也是各色各样的。对于青年人的正当需要,应当予以满足;对于青年的指导,不能只限于讲革命的道理;反对享乐的人生观,不是要提倡禁欲主义。杨贤江认为必须全面关心青年的生活,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帮助青年过“正常生活”。杨贤江所指的“全人生指导”有广泛的涵义,既指德、智、体、知、情、意的全面教育,也指对青年的求学、择业、交友、恋爱、家庭以及为人处世、兴趣爱好的全面关心与指导。他说:“向来的学校教育,大都偏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青年问题的探索,未尝加以留意。换句话说,就是未能为全人生的指导;于书本的教室的课业以外,对于如何过日常生活,如何交友,如何消闲,如何处世,如何发现并解决本身各种问题,如何满足并发达学生所喜欢做的活动,都在所不问,这怎能完成他的指导人生的职责呢?”(《中学训育问题的研究》1925年)他认为青年问题,就是在青年的

生活上所发生的困难,凡是青年生活上发生困难之处,青年工作者都应尽力帮助他们解决。杨贤江编辑《学生杂志》的指导思想,除了引导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之外,可以说就是贯穿着“全人生指导”的思想。《学生杂志》既突出思想政治教育,也兼顾青年各方面的问题与需要。除刊载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各科知识和学习方法的文章外,对于青年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生理现象、体育锻炼、品德行为以及社交、恋爱、婚姻、家庭、就业、文化生活等方面,都占相当篇幅,并经常组织学习、生活问题的专号,借以指导青年过健康的正常生活。他认为:一个革命的青年,应该是一个过健康的、正常生活的青年。指导青年立志改造社会与过“正常生活”是一致的。而杨贤江同志自身,就是一位革命与生活结合得很好的典范。

多年来,我们对于青年的指导,着重于政治立场、阶级觉悟,这是必要的,但是,对于青年人生活中的问题与需要,很少注意,甚或避而不言,怕关心与指导他们的生活问题,会被指责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德育内容简单枯燥,同丰富多采的青年生活与青年心理严重脱节,青年指导效果不够理想。杨贤江的以树立革命人生观为核心的“全人生指导”这一基本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二)如何看待青年问题,是做好青年教育工作的前提。青年问题的形成,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青年身心发展的特征。既要从社会发展的要求去确定青年指导的方向、任务,又要根据青年身心发展的规律去研究青年指导的原则、方法。杨贤江就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点和教育观点来看待青年问题,分析青年问题,对于形成青年问题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有着深刻的认识。

首先,他不是孤立地去看青年问题,而是把青年问题摆在整个社会问题中来研究,看作是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问题在青年身上的集中反映,从而把教育青年、解决青年问题与改造社会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看成是革命者的责任。

杨贤江分析当时的社会,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封建军阀连年混战,官僚地主重重压榨,加上天灾频仍,农村破产,民不聊生,以致大多数青年,失学失业;少数青年,幸得上学就